

农史研究的执著追求与广域探索

——读张履鹏先生《中国农业历史研究》

王星光 孙刘伟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河南郑州 450001)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8)06-0135-08

中华文明属于典型的农耕文明形态,农业是古代中国社会经济贡献率最大的生产部门,从古至今,对农业的认识不绝于史册。农史是以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的观点研究农业生产与技术、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及农业思想历史演进及其规律性的一门交叉学科^①。农业历史的综合研究需要贯通自然科学尤其是农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且在农史学理论、农业科技史、农政史、农业经济史、农业考古、农业文化史等诸多领域有专精的造诣和功力,因而,有能力对中国农业历史进行多视角、多领域的综合性研究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张履鹏教授数十年耕耘在中国现代农业科技和农业历史的沃土上,是当今农史学界为数不多的既有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实践经验、又在农史学研究领域笔耕不辍、多有创获的著名学者,他曾担任首届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的副理事长和河南省农史研究会会长。2016年9月先生的《中国农业历史研究》专著由花木兰文化出版社正式出版^②,该书是先生几十年如一日辛勤创作硕果的结集,其学识之渊博,视野之开阔,学问之精妙,均集于此著。周肇基先生在为此书作序中指出:“《中国农业历史研究》内容广泛,各篇内容都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科学性,该著作出版乃农史研究的大事”^③。因此,我们深感有责任向学界介绍这部中国农史研究的力著,以饕同仁。

张著40余万字,分上、下两册,是花木兰文化出版社近年来重点推出的《古代历史文化研究辑刊》第十六编的第二十四册和二十五册。上册包括序言、农业开发史篇、农业经济史篇、农业技术史篇、农业遗产与考古篇、农田制度史篇等,下册包括农业财税金融史篇、农业商贸旅游史篇、农业社会史篇等。尽管张著是作者的论文汇集,但由于作者研究问题的整体性、宏观性、贯通性思维特点,加之张著所收录论文选题从史前一直延伸至当代,内在逻辑是贯通的,使得张著又可以看作是一部体系较为完整、内涵丰富的中国农业历史研究专著。

(一)农业开发史篇

张先生从不把考虑农业问题的思路局限在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而是着眼全局,从根本上观察和分析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国策带动了农业开发和综合利用的高潮,但农业资源的开发质量关系到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黄淮海平原横跨七省区,农耕历史悠久,自古至今一

[收稿日期] 2018-10-28

[作者简介] 王星光(1957—),男,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农史与环境史研究;

孙刘伟(1983—),男,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南农业大学林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农史与饮食史。

① 王思明:《农史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国农史》2002年第4期。

② 张履鹏:《中国农业历史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研究辑刊,第十六编第二十四册、二十五册),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6年9月。以下简称张著。

③ 见张履鹏:《中国农业历史研究》序。

直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张先生很早就开始关注黄淮海平原的农业开发问题,这一地区虽然农业历史悠久,但是农业生产效率却低而不稳,当时还存在旱、涝、沙、碱等问题,研究其农业发展历史,找出规律,如何避免开发的盲目性,这是亟待解决的难题。本篇收录《黄淮海平原垦殖史略》(曾刊载于《中国农史》1983年第2期)一文就是其思考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成果,文章将黄淮海平原的农垦历史分史前、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和明清等七个历史时期,在分析每个历史时期国家统一和分裂等局势,以及人口的数量等因素的基础上,重点以黄河等主要河流的灾害和治理、作物种植结构调整为中心展开论述,指出了地理条件及生态环境与农作物种植发生变化的关系。文中用较大篇幅对黄淮海平原各个历史时期的水利建设、作物布局和粮食产量进行系统分析,进而总结出黄淮海平原农业开发的经验和教训,提出重视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维护,作物布局采用多种作物轮作制是先民较为成熟的耕作方法,而如今应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注重发挥开发的综合效益,从而实现区域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为黄淮海平原农业的开发提出了镜鉴。由于先生这篇论文研究区域范围较广,并且贯通古今,提出的很多观点被不少学者引用和参考^①。

农业开发的基础是对农业资源的准确评价,农业资源是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或农业经济活动所利用或可资利用的资源,包括农业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其中农业自然资源包含农业生产可以利用的自然环境要素,如土地资源、水资源、气候资源和生物资源等。本篇收录的《魏晋南北朝农业资源开发利用概述》(曾刊载于《中国农史》1990年第3期)重点讨论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农业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从气候资源利用知识的发展、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利资源的开发、生物资源的利用等四个方面分析了该时期我国农业资源开发利用的方式和方法。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但该时期农业继承了汉代农业技术进步的基础,农业生产力不断发展。而在先生发表该文之前,20世纪80年代大陆学界研究该历史时期农业历史的文章数量很少^②。该文所提出的观点是对这一时期农业发展的整体性概括,对后来学者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农业史具有借鉴意义^③。

张先生是原河南财经学院建校五大教授之一,是河南省农业经济区划和土地评估规划的知名专家。本篇收录的《河南省农业经济区域历史发展简述》和《河南省黄河故道和滩地开发研究》分别于1984年和1993年在《河南财经学院学报》发表。其中《河南省农业经济区域历史发展简述》一文重点论述了各个经济区的形成历程,并提出各个经济区互相结合发展的重要意义。《河南省黄河故道与滩地开发研究》一文,是运用实地调研方法的力作之一,张先生不辞辛苦亲自带领河南财经学院1986级和1987级本科同学,深入农村基层开展实地调研持续时间长达三年,在新乡县黄淮海开发办、原阳县计委等九个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对黄河滩地和故道开发的自然和经济环境有了切实的了解,认为开发具有多方面的优势,进而提出开发的指导思想、原则、总体规划、具体开发方案和治理措施,并对开发的经济效益进行了科学评估,这些都有力指导了当时河南省的农业土地评估和区域经济开发。由于该项成果实地考察调研成果显著,可操作性强,在生产实践上具有重要指导价值,该文曾荣获河南省社科院优秀论文奖、河南省教委科研成果一等奖等奖项。

① 吴忱:《河北平原旱地农业环境原理初探》,《河北农学报》1985年第4期;苏全有:《河南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李开封:《中世纪暖期豫北地区水灾灾害研究》,《自然灾害学报》,2007年第2期;杨海蛟:《明清河南林业研究》,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朱永亮:《元明清时期南运河流域水环境影响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② 黄惠贤运用传世文献和考古材料于1985年在《北京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发表《魏晋南北朝时期农耕方式及农业生产水平试探》一文。

③ 秦冬梅在《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气候异常与农业生产》(《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一文中在该时期物候知识研究方面参考了张先生的研究成果。

(二)农业经济史篇

广义的农业经济包括土地制度、农业政策、农业生产、农村组织、农民的身份地位和生活状况等方面内容。粮食问题是农业经济史研究的核心课题,该篇收录的《西汉文景时期的粮食生产水平刍议》一文,对历史时期粮食作物生产水平进行了理论概括,并把研究内容归纳为六点:该时期劳动力的垦田亩数、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农业人口平均口粮数、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所能提供的剩余产品数量及其分配状况等。这些简洁而精到的归纳概括,如果没有深厚的积累和敏锐的洞察,是提炼不出来的。在先生发表本文之前,国内学界关于西汉粮食生产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少^①,该时期粮食研究主要集中在粮食政策和粮食供给方面,先生此文关注该时期粮食生产水平,并且用严格的考据方法,对比各种史籍记载的文景时期的粮食产量数据,同时结合最新的考古学资料,得出的结论可信度较高。

耕作制度是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利用方式以及有关的技术措施的总称,主要包括作物种植制度和与种植制度相适应的技术措施,其中种植制度是耕作制度的中心和主体。该篇收录的《我国农田耕作制度的发展史》一文提出:“在人类农业史上,有两种耕作制度,即浅耕粗作、广种薄收和深耕细作、少种多收。一定的耕作制度,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在农业生产中的具体体现;不同的耕作制度,反映着不同的生产社会性质和技术状况。”^②作者把我国农作制发展过程概括为生荒及熟荒耕作制、休闲耕作制、轮作制度、精耕细作等四个阶段,这多为学界所认同。

作物布局是指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生产单位内种植作物的种类及其面积比例与区域配置或田块配置,作物布局是种植制度的主要内容。近年来全球变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而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就是大气层中含有的二氧化碳越来越多,农作物是重要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源,也具有强大的碳汇功能,气候与作物布局的关系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我国历史上作物布局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能够为当今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提供历史鉴戒。张先生是较早关注这一学术领域的学者之一,该篇收录《我国历代作物布局的演变》一文于1983年2月在《农史研究》发表,作者通过长时段深入考察我国历史时期的作物布局,认为生态环境、作物品种及其种植和加工技术是影响作物布局的最重要的因素。比如在生、熟荒耕作制阶段,由于农作条件很差,杂草容易滋生,中原地区主要粮食作物是黍类占首要地位,因为黍类作物生长旺盛且生长期短,而且只需较少的水分,很适合与杂草竞长。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北方旱地耕作技术成熟和南方水田农业技术发展迅速的时期,有重要的农书《齐民要术》问世,该时期的农业生产状况是农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该篇收录《魏晋南北朝区域农业生产概况》这篇名文中关于该时期几个农业区^③的形成过程的论述在学术界影响较大,被学界同仁多次引用参考^④。作者认为由于魏晋南北朝特殊的政治和经济状况,结合自然条件特点,此时期形成与其他朝代不同的区域农业生产特点,最终形成不同的农业区。在作物种植方面,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大田作物种类基本是汉代的延续,但大田作物的搭配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泛采用禾谷类和豆科轮作,并往往在轮作中加入绿肥作物,形成用地养地结合、灵活多样的轮作体系。在适应和改造自然方面,文中探索性地将农耕技术的进步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气候干旱化的趋势相联系,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及农业自然灾害,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旱作农业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耕—耙—耨为中心的抗旱保墒技术,这些观点都是很中肯的。

① 2013年刘志平先生运用《焦氏易林》这部大致成书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的特殊文化典籍对西汉时期粮食亩产量进行了分析。

② 张履鹏:《中国农业历史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6年9月,第63页。

③ 江南农业区、淮河农业区、黄河北部农业区、北部牧业区、巴蜀农业区、西北旱农区等。

④ 其中代表性的有:李文涛《气候视野下的北朝农业经济与社会》,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45页;王玉珊《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页。

(三) 农业技术史篇

技术史是研究人类控制和改造自然的历史。农业技术史是阐述农业技术从低级向高级、由经验形态的技艺向理论形态的技术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农业技术史研究长期处于农史研究的核心地位,其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对于历史上各项农业技术措施作出符合实际的考察、鉴别与科学的评价。如分析“畎亩法”“代田法”“区田法”等技术如何产生及适用的地区范围及推广情况等。

“代田法”亦称“代田”,是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总结西北地区的抗旱经验所推广的一种耕作方法,它所包含的先进技术因素被后世继承和吸收,对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内关于代田法相关的研究成果,以通史性成果居多^①,张先生是国内较早发表专题论文研究“代田法”的学者,该篇收录了《汉代推行“代田法”在农业技术改革中的作用》一文^②,该文对代田法的概念、产生背景以及推广价值概括得简洁而确当。作者写道:“由于在同一地块上作物种植的田垄隔年代换,所以称为代田法。代田法首先体现了耕作制度的改进。代田的技术改革的综合表现,反映了汉代牛耕和农具改革的发展。代田法在用地养地、合理施肥、抗旱保墒、光能利用、改善田间小气候和防倒伏诸方面多有建树^③。张凤博士在其《“代田法”再认识》一文中强调张先生关于代田法中“一亩三耨”的观点独辟蹊径^④。

《汜胜之书》是现存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一部农书,书中记载了一种利用马骨汁、羊粪等处理种子的办法,这是一种古老的种子处理方法,万国鼎先生称之为“洩种法”^⑤。本篇收录《洩种法研究》一文在《农业遗产研究集刊》^⑥(1958年第2册)上发表,据先生介绍,文章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万国鼎先生的指导。吴存浩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农业史》一书中对张先生《洩种法研究》给予很高的评价^⑦。本文是作者亲自试验的总结,种子的处理方法参照了《汜胜之书》的记载,并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实际操作。从试验的结果看,发现洩种法是“表现增产的”,至于增产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洩种法在种子周围的拌种材料中含水分较多,促进了种子萌动,提早出苗;二是洩种处理的幼苗强健,幼苗生长快;三是洩种法起到施“种肥”作用,给幼苗创造了良好的发育条件。在文章结论部分,张先生指出洩种法也存在一定缺陷,比如种子处理比较麻烦,播种也比较困难,不如现在所采用的一些种肥办法方便快捷。

在汉代农学史中,区田法占居特殊的地位,它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改造土壤环境以夺取丰产的重要创造,是抗旱栽培有效的耕作方法,现在旱区在抗旱播种时还可根据这样的道理创造性地应用。张先生是农史界率先在田间对“区田法”进行实验研究的学者。杨庭硕先生指出:“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石声汉先生的《汜胜之书今释》和万国鼎先生的《汜胜之书辑释》可谓‘区田法’研究的开山之作。除了在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之外,‘区田试验’在这一时期也非常盛行。‘区田试验’的试验点大多集中在河南、甘肃等地,其中以张履鹏先生在河南辉县的试种影响最大”^⑧。本篇收录了《古代相传的

① 代表性著作有:闵宗殿《中国农业技术发展简史》(农业出版社,1983年);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

② 张履鹏:《汉代推行“代田法”在农业技术改革中的作用》,《中国农史》1988年第1期。

③ 张履鹏:《中国农业历史研究》,第97页。

④ 张 凤:《“代田法”再认识》,《古今农业》2015年第4期。

⑤ 详见万国鼎:《汜胜之书辑释》,中华书局,1953年,第45-61页。

⑥ 1955年7月,经有关部门批准,在南京农学院(即现在的南京农业大学)农史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该室创办了我国农史学科最早的学术刊物《农业遗产研究集刊》和《农史研究集刊》,至改革开放前只出版了两辑。

⑦ 具体参阅吴存浩:《中国农业史》,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第388页。

⑧ 杨庭硕:《中国农史研究必须正视环境差异——对汉代关中“区田法”的再认识》,《中国农史》2016年第1期。

区田栽培法》一文,在论文写作之前,作者进行了广泛的资料收集和实验准备,尤其重视流散在民间的材料,如河南流传的清代的《区田解说》及河南淇县冯绣所写的《区田试种实验图说》。在遍览关于区田的书籍后,作者发现区田的栽培方法各书记载并不一致。为了掌握运用区田种植的第一手资料,他于1956年在河南辉县试用区田办法种粟一亩,生长的结果是没有倒伏现象,亩产314.6斤,在该年雨水成灾的情况下,比一般耕作法产量为高。通过“区田法”种粟的实验,结合当时各地的区田栽培实验,发现区田栽培的产量与古代书中所载有出入。这又激发了作者对区田法在生产上作用的探讨,在翻阅古籍资料后,发现我国北方自古以来旱灾史不绝书,当时较适合点种的秋粮高秆作物较少,古代旱田最主要的作物为粟,但是粟植株较小,每亩株数多,如行条播,抗早点种和浇水保苗都有困难,采用“区田法”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经过反复实验和对农史文献的认真分析,并向农史学家王毓瑚先生虚心求教,终于完成《古代相传的区田栽培法》一文,发表在1957年的《农业学报》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刘驰先生在《区田法在农业实践中的应用》一文中指出:解放后张履鹏和杜豁然两位先生对区田法试验和调查的记录,“远较前人的详尽可靠”^①。我国古代先民留下了丰富的农业科技文化遗产,尤其在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的今天,很有深入挖掘和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必要,而要做好转化和创新工作,就离不开农业科技人员等的大田实验,张履鹏先生当年为了摸清古代农业技术真谛而深入田间地头进行耕作试验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只有把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和现代农业科技相结合并付之于生产实践,才能不断焕发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强大的生命力,为发展现代化的生态农业做出贡献。

(四)农田制度史篇

田地是经过人耕种的土地,田制是统治者管理土地的制度。中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根据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历代统治者均制定、施行了一定的田地制度。近年来张先生在农田制度史领域陆续有三部专著出版^②,其中《宋代奠定的佃耕制及其后世沿革》是目前所见国内学者出版的唯一一部关于宋代佃耕制的研究专著,《两汉名田制的兴衰》同样是目前所见国内唯一的关于名田制的研究论著。名田制和佃耕制是中国历史上两种重要的农田制度,可见先生在中国农田制度史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这在《中国农业历史研究》一书中有充分的体现,农田制度史篇所收录的七篇文章,与名田制相关的有两篇,研究佃耕制的有三篇。其中的《历代田制的分期回眸与展望》一文,将中国的田制史划分为井田制、名田制与豪强庄园制、均田制、佃耕制和集体制等五个阶段。在分析各个历史阶段田制特点的基础上,作者提出:纵观中国历代田制的发展变化,推动变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主导因素是生产力的发展;田制是随着社会发展,遵循着规律,有一定的发展阶段,而且难以逾越;总之,田制对于农业生产至关重要,需要不断改革,以适应经济发展。

本篇收录《汉初名田制执行情况探讨》一文中,先生认为近年来由于“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以及一些重要文献、文物、遗址的出现,对汉初名田制的执行的研究有了更为可靠的材料。结合汉代正史《汉书》等的相关记载,文章得出结论:汉初名田制已经日臻完善,处于基本成熟期,推行名田制已成为汉代四百余年土地制度的基本国策。

本篇收录的《庄园制与佃耕制不同时期土地改革问题的差异》一文,探讨了佃耕制千年不衰的缘由,先生认为佃耕制的实现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社会综合发展的结果。佃耕制使土地买卖频繁,土地地权经常转换,使一些人利用经济手段亦可获得土地所有权,减少了用暴力夺取土地的可能性。作者还重点剖析了宋代较普遍实行佃耕制的原因:当时出现了许多庶族地主;土地零细化、土地买卖频繁、劳动力自由化,导致大量的雇工出现等。先生这些贯通古今的通透洞察力和独到的学术见识,对当今

① 刘驰:《区田法在农业实践中的应用》,《中国农史》1984年第2期。

② 三本专著分别是:《中国农田制度的变迁与展望》,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宋代奠定的佃耕制及其后世沿革》,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5年;《两汉名田制的兴衰》,中国农业出版社,2015年。

土地制度的调整和完善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五)农业遗产与考古篇

农业文化遗产是我国的宝贵财富,目前我国农业面临的很多问题都能在我国重要的农业遗产中找到解决对策。本篇收录《漫谈研究继承农业遗产》一文于1963年在《河南日报》发表,文章认为我国古代的农学著述不但数量较大,而且质量很高,比如《汜胜之书》《齐民要术》《王氏农书》和《农政全书》等著作的很多内容至今仍然使我们感到惊奇和自豪,深入研究和继承古农书的有关农业理念和生产技术在现今仍有必要。他还提出研究我国古代农学遗产,同时需要重视研究总结农家谚语和地方志书等。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由于中国农业考古学的奠基人陈文华先生的大力倡导和积极推动,农业考古学这一新的学科在我国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张先生也是农业考古与农业历史研究相结合研究的积极参与者。他十分关注各地出土的农业考古资料。河南内黄三杨庄遗址自2003年被发现以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相关领域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遗址的性质、成因、聚落形态及农业耕作技术等有关问题进行了多学科、多方面的探讨。本篇收录的《国内首次发现保存完整的汉代村落遗址》一文是国内学者中较早把三杨庄遗址考古材料与农史文献相结合并加以互证的力作。由于张先生多次到三杨庄遗址实地考察,并与该遗址考古发掘负责人刘海旺研究员合作研究、深入研讨,论文材料翔实,论证透彻,改变了以往单纯依靠文献、图像资料和模型明器来研究汉代农耕文化和农业生产的状况,使人们对《汉书·食货志》等文献对“代田法”的记载有了新的直观的认识。

张先生是我国谷子起源问题的早期探索者,本篇收录《谷子的起源与分类史研究》一文发表于《中国农史》1986年第1期。关于谷子的起源问题,文章主要运用史前文化遗址出土实物加以证实,并对谷子在史前农业生产的主要生态环境进行了探索,认为该时期谷子的生产地并非完全是干旱地区。粱与粟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作物分类上所关注的问题,该文参照洛阳“烧沟汉墓”出土的粮食和陶仓上的粮食名称,运用名物学的研究方法,对粱与粟的异同进行了分析。张先生这篇文章发表以来,目前该文的主要观点被引用超过20余次^①。张先生不但是谷子起源问题的早期探索者,在谷子育种方面同样有杰出贡献。据先生介绍,1949年春,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先生刚满20岁,和那个时代众多爱国进步青年一样,他带着火一样的热情来到了当时刚成立的位于菏泽的冀鲁豫行署农业试验场,带领三位学员开始了杂交谷物的育种工作,从此走上了农业科技的探索之路。由于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科学研究必须自力更生,先生自学农业科技知识,经常深入到农村搞调查研究,不知疲倦地在田间进行反复耕作、栽培实践,终于在1958年培育出我国第一个定型的谷子杂交新品种,成为农学界公认的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谷子杂交种的培育者^②。当时正值国内三年困难时期,这项成果及时解决了粮食增产问题,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和各级政府的充分肯定。图1是当年先生在河南新乡农科所工作期间当地媒体的报道配图,图中先生读书专注的神情使我们有机会看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高度敬业和执着追求的精神风貌。先生是我国第一个谷子杂交种的培育者,1963年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知识分子深入农村,劳动农民钻研科学,河南涌现一批优秀农业科学人才》的评论员文章,文中对张先生深入农村,总结谷子栽培能手的种田经验,并进行科学实验的态度和方法给予高度评价。

(六)农村社会史篇

随着近年来社会史研究的蓬勃开展,农村社会史开始在农史研究领域占有一定的地位,张先生对

① 文章引用情况有:王星光、贾兵强和李秋芳等众多学者发表的学术论文16篇;李凯学、李艳红和芦宁等硕士学位论文3篇,何红中、吴文婉和朱正西等博士学位论文3篇。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名录·1992年卷第1分册》(国家人事部专家司编,1995年)记载:“河南财经学院张履鹏教授为全国谷子育种研究主持人,开创谷子杂交育种,培育品种20个,推广效益达11.17亿元”。

农村社会史方面的研究特色很是鲜明,尤其社会关怀色彩极其浓厚。

官员俸禄制度是官制研究的重要内容,我国古代官员对社会发展有引领作用,因此官员俸禄制度事关官员切身利益,不仅深刻影响政治发展,还必然对社会和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农业在我国古代经济生活中一直居于支配地位,政府的税收来源于农业的比例最大,官员的俸禄均直接或间接取之于农业。本篇收录张先生《农业状况与古代官俸关系》一文选题角度新颖,文章从历代农业政策、农业生产方式、农业制度等方面与官员薪俸制定的关系进行探讨,指出古代官员俸禄的高低“一要看官员的贡献;二要照顾农民的生活水平,”并认为“这是古代官府制定俸禄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指出俸禄对于官员的廉政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增加俸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养廉防贪作用。

历史上我国人口多数居住在基层,基层稳则国家稳。我国古代基层政权的行政环境复杂,并且政治敏感性强,因此古代农村基层行政改革是各个历史时期当政者保持基层稳定而重点解决的问题。本篇收录《农村基层行政变革历程》一文是张先生在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变革”这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上的探索成果。文章以田制与基层行政的关系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了井田制、名田制、庄园制、均田制和佃耕制下农村的行政组织的构建和变革。文章第二部分深入研究了历代农村基层行政的任务和特点,认为“教化、治安、睦邻”为农村基层行政的主要任务,主要特点包括非正式官员开支低微、乡土气息浓厚和官气小等。文章结论部分联系当前部分农村地区相对衰落的现实,提出农村要加快改变气氛沉闷的精神状态,创造条件使大量的农村人才有用武之地,同时积极吸引人才回到农村安居和创业。

(七)其他篇章

其他篇章包括农业财税金融史篇、农村商贸旅游史篇等。农业财税金融史和农村商贸旅游史从宏观上来讲可以纳入农业经济史的研究范畴,张先生将二者单独列出,足见二者在农史研究领域的特殊价值。

农业财税金融史篇所收录的文章主要集中在农税变革和货币起源与农业的关系领域,其中分别以《历代农税改革探讨》和《农业生产发展与货币的起源》为代表。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国古代社会,关于历代农税改革问题属于我国古代政府财政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历代农税改革探讨》一文中,张先生认为我国古代农税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并试图解决纳税不均和逃税等问题。从几次农业税收改革都能实行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来看,这些税改措施基本上是符合古代农业社会发展规律的。该文研究贯通我国历代的农税改革,从先秦一直到明清,对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史研究都颇有参考价值^①。

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研究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问题的开先河者是王毓铨先生,其代表作是其专著《中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②。随后关于我国古代货币起源的研究有更多的学者加入,其中以复旦大学叶世昌教授在该领域成果最多且众多观点得到学界认同,叶世昌教授认为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是多元的。张先生《农业生产发展与货币的起源》一文则是一篇从我国古代农业发展的角度谈论货币的起源问题的重要文章,先生认为我国古代货币的形成和发展和农业发展是同步的,不但货币的外形来源于农业生产,货币的职能也是随着农业的进步而不断扩大。这个重要观点丰富了我国古代货币起源多元化的观点,因为中国古代长期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时期,货币的起源与发展自然与主要经济形态相伴而生。

农村商贸旅游史篇所收录的文章主要集中在商业的发展环境和宋代农村休闲旅游等领域,其中

① 《历代农税改革探讨》发表于2004年,2005年厦门大学历史系何世鼎和王万盈先生在《中国经济史研究》发表《2004年先秦秦汉经济史研究述评》一文,把《历代农税改革探讨》一文中先秦秦汉部分的内容列为2004年先秦秦汉小农经济研究领域的重要文章。

② 王毓铨:《中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科学出版社,1957年。

分别以《重农政策与官工官商关系》和《宋代田园诗中所见的农村经济》为代表。国内学者关于古代中国“重农政策”的研究较为透彻,而直接研究“官工官商”的成果较少,二者关系的研究成果更是凤毛麟角,先生《重农政策与官工官商关系》这篇文章选题学术价值突出。文中提出:我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始终以“重农政策”为基本国策,总体上重农政策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官工官商”是我国古代君权专制在经济领域的体现,中国历代政府依靠政治力量,“官工官商”始终占有优势,但对“官工官商”促进农业发展的作用并不宜扩大,它却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妨碍农村商品化、区域化和专业化的进程。

田园诗在宋代出现繁荣之势,宋代田园诗是中国田园诗发展的高峰^①,史料价值很大,尤其对宋代农史的研究关联密切。张著收录的《宋代田园诗中所见的农村经济》一文,对宋代田园诗的盛行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一方面是文人的努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的结果。文章主要从田园诗反映的宋代农田水利建设、农村政治和经济状况以及对普通农家农业劳作等方面来探讨当时的农村经济状况。

通观编入《中国农业历史研究》的49篇论文,可以清晰地看出作者的研究旨趣:选择中国农史发展中具有整体性和基础性的重要问题去挖掘探研,涉猎广泛且力求深入,几乎将中国农史相关的研究领域都囊括其中,尤其对农业经济史的研究多有建树。通过对中国农业历史纵向长时段的考察和横向剖面的深刻分析,展示了一位资深学者的卓犖学识和精湛见解。如果从先生发表第一篇农史文章开始算起,时至今日张先生已经从事农史研究将近60年^②,几近一个甲子的研究历程。张先生学术生涯的高峰是参与编写《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这个国家出版工程,该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张先生排名第六,前五名分别是梁家勉先生、章楷先生、闵宗殿先生、李根蟠先生、游修龄先生等农史大家。张先生主持编写魏晋南北朝农业科技史一章,是难度较大、分量较重的部分。因为该时期中国正处于民族大分裂、大迁徙、大融合的动荡过程,千头万绪,材料收集和整理难度很大。张先生还是克服重重困难如期高质量地完成了该章的撰写,这与他长时期持之以恒的治学态度和丰厚学养分不开。即使近年来年事已高,先生仍然积极参与农史学会的活动,书中《河南省农史研究会三十年回顾与展望》也为我们了解河南乃至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发展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从中可见他在学会组织和农史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中国农业历史研究》一书围绕农业开发史、农业经济史、农业技术史、农田制度史、农业社会史等内容,就中国古代农业的众多学术领域展开了系统研究和大胆开拓,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观点,显示了张履鹏先生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勇于探索的可贵精神,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张著彰显的求实致用、立足实验、敢于担当、大胆创新的精神和品格,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大力提倡的。目前先生已是89岁高龄的耄耋老人,但他依然笔耕不辍,对当下的“农业历史与乡村振兴”和“乡贤与农村风俗”等热点课题仍在孜孜以求,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究。正如闵宗殿先生为张著作序中所言:“张先生的文章同为人一样,醇厚、朴实而又深沉。我喜欢他的为人,也喜欢他的文章。《中国农业历史研究》的出版,我心中既高兴又激动”。张先生其人朴实醇厚、德劭望重,其文博学精湛、富于创新,令人感佩不已。2019年是张先生的90华诞之年,谨以此文向张履鹏先生表示我们最美好的祝福:恭祝张先生健康长寿,颐享天年,不断有惠及学界及后辈学人的研究成果问世。

[2019年是张履鹏教授90华诞之年,谨以此文深表敬意和诚挚祝贺]

① 刘文刚:《繁荣美奂的宋代田园诗》,《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② 《洴澂法研究》和《冬谷实验及调查报告》这两篇文章发表与1958年,《西汉文景时期的粮食生产水平刍议》《从柴山保土地革命谈佃耕制》和《西汉名田制执行中的卖爵与赐爵》等三篇文章发表于2015年。